

汤因比论汤因比

—— 汤因比 - 厄本对话录

[英] 阿诺德·J. 汤因比 著
G.R. 厄本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K01
901-2

汤因比论汤因比

——汤因比—厄本对话录

[英] 阿诺德·汤因比

G. R. 厄本 著

胡益民 单坤琴 译

周佐虞 章忠国 校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厄本对话录/(英)汤因比
(Toynbee, A. J.)著；胡益民，单坤琴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2

ISBN 978-7-100-08676-9

I. ①汤… II. ①汤… ②胡… ③单… III. ①历史哲学
②史学理论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348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汤因比论汤因比

——汤因比—厄本对话录

[英] 阿诺德·汤因比 G. R. 厄本 著

胡益民 单坤琴 译

周佐虞 章忠国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676-9

2012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1/4

定价：18.00 元

104
101

© Arnold J. Toynbee and G. R. Urban

TOYNBEE ON TOYNBEE:

**Conversation Between Arnold J. Toynbee
and G. R. Urb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4

根据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4 年版译出

著 本 氏 厄 尔 阿 尔 尼 德 威 尔 逊

译 者 孙 中 华 孙 中 华

出 版 社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清华大学图书馆
The Communist Party

1974年·北京

译者前言

安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nybee, 1889~1975)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史学大师和著名历史哲学家之一。其长达十二卷的史学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对现代西方世界的影响是相当深入和广泛的。此书出版于1954年的索麦维尔(D. C. Somerrell)节缩本,1964年即有曹未风先生等的中译;故我国读书界对汤因比其人其学并不陌生。

这部《汤因比论汤因比》(《Tonybee on Tonybee》)是1972~1973年度汤因比与自由欧洲电台著名播音员厄本(G. R. Urban)录制的十二篇系列广播谈话录,1974年由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对话双方,一为知识渊博、机智敏捷的读书节目主持人,一为因著作等身、充满睿智而誉满全球的83岁高龄的史学大师。厄本知识丰富,提问时言词生动、机灵,善于捕捉要点;汤因比的对答则谈笑

风生,既海阔天空、轻松自若而又时时紧扣主题。因此,这本小书就内容而言,是汤因比一次系统地阐发自己历史观点的精心之作;其文体风格亦特别引人入胜,读起来令人兴味盎然。

据汤因比自传《经历》(*Experiences*)^①一书所述,汤因比 1889 年 4 月 14 日生于英国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先后在茶叶进出口公司和慈善机构任职。母亲则是大学毕业生,“在我之前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之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与儿时受母亲的熏陶密不可分,只是他受到的历史训练比母亲“更为老式”(见《我的历史观》)。汤因比自小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经历》一书仅谈希腊-罗马古典教育和学院生活的内容达四十余页之多;本谈话录中亦多次谈到希腊-罗马古典教育对自己的良好影响。22 岁时毕业于牛津大学。1912 年,年仅 23 岁的汤因比回到他的母校牛津大学贝力奥学院担任古代史教师,这是他其后 50 余年学术生涯的开始。

1914 年,正当他“在给贝力奥学院专攻古典文学的大学生们讲授修昔底德的著作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①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9 年版,纽约和伦敦。

这一突发事件使他“茅塞顿开：我们现时的所有体验，早已被修昔底德在他那个世界体验过了”（同上）。这使他感到，需要用一种综合的、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文明史。1919年，他被正式任命为伦敦大学教授。次年（1920），受命主持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的年刊《国际事务概览》（“*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也就在这一年，他开始了《历史研究》这部巨著的构思。这部著作花了他35年以上的时间。

1941年，汤因比以英国皇家科学院研究员的身份前往美国讲学，并应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邀请，在那里完成了此书最后几卷的写作；1954年出齐全书12卷。其后，仍孜孜不倦地反复探讨，写成一系列文章，结集成《再思集》一书出版。

汤因比是一个充满良知的人文学者，一生身历两次世界大战。除学术研究而外，还积极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英国外交部情报司任职，1943~1946年任研究司司长，多次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并参加过1946年的巴黎和会。他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友好感情，1931年曾到中国旅行，回国后写成《中国行纪》一书出版。

《历史研究》一书倾注了汤因比的大半生心血。其价值,诚如哈佛大学教授索罗金(P. Sorokin, 1889~1968)所说:它出版后虽也受到过少数反诘,“但它仍不失为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综合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仍充分表现了历史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又体现出一个极为细心的实证主义者的技巧和功力。因此,这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对于史学家、历史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学家以及任何一个对文明之出现、生长、衰落与死亡问题有兴趣的人,都是十分重要的”。^①

汤因比认为:“无论在自然科学或人类事务研究方面,对于什么是偶然,什么是法则或规律,检验二者的尺度乃是人对大自然的非人工部分结构和人性之理解。在人性和大自然的物质之中,一定有某种共同规律性因素”(本书上篇)。而正是这种“好奇心”促使了他从事综合研究方法来探究这些普遍性“规律”。“综合性研究”的方法和由此得出的普遍性规律,是汤因比本人,也是索罗金等著名史学家所非常看重的。本书的上篇“论方法”主要是畅谈这一点的。

在汤因比看来,历史研究的真正对象既不是描述那些

^① 索罗金:《汤因比的历史哲学》(“Tonybee's Philosophy of History”),见论文集《汤因比与历史》(“Toynbee and History”)第172页, An Extending Horizons Book, Porten Sargent Publisher Boston 8. Mass.

在时空上彼此接近的事件,也不是国家、社会群体或全人类作为一个“单位”的历史,而是文明(Civilization)。他在《历史研究》第一卷中明确提出:“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范围……乃是文明(或曰‘社会’)——它们在空间上和 时间上都大于民族、国家、城邦或其他任何政治组织”。“历史学家所必须处理的‘社会原子’不是国家,而是‘社会’”。因此,须把宗教的特征和领土以及部分政治上的综合特征合为一体来加以考察;唯有“文明”(社会)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正确的对象。研究一个文明的出现、生长、衰落、消亡及其原因,才算尽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天职。对于这一点,本谈话录中也数次提及。

对于历史上的文明(Civilization in History),汤因比先列举了 21 个:西方文明(the Western)、两个东正教文明(two Orthodox Christian[in Russia and the Near East])、伊朗文明(the Iranic)、阿拉伯文明(the Arabic)、古代印度文明(the Hindu)、两个远东文明(two Far Eastern)、古希腊文明(the Hellenic)、叙利亚文明(the Syriac)、印第安文明(the Indic)、古中华文明(the Sinic)、克里特文明(the Minoan)、苏美尔文明(the Sumeric)、赫梯斯文明(the Hittite)、巴比伦文明(the Babylonian)、安第斯文明(the Andean)、墨西哥文

明(the Mexic)、尤卡坦文明(the Yucatec)、玛雅文明(the Mayan)、古埃及文明(the Egyptiac);再加上5个“停滞了发展的文明”:波利尼西亚文明(Polynesian)、爱斯基摩文明(Eskimo)、游牧文明(Nomadic)、鄂图曼即土耳其文明(Ottoman)、斯巴达文明(Spartan),共计26个文明^①。他广取博收,在充分地掌握了这26个文明(社会)的材料后,就首先研究文明的起源问题:为什么有些文明(社会)如同原始部落那样,在一个比较早的时候即突然止步,而不像其他一些文明那样达到文明社会的水平?

他反复潜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文明是由两个条件在一种特定的结合中形成的。其一,一个社会需要一部分“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人”;其二,那里的环境“既不太有利也不太不利”。在这两个条件下,文明活动一方面是外在环境的不断“挑战”(Challenge)^②,而这个社会则通过少数“具有创造力”的人对“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Response),解决问题,接着又是新的“挑战”和新的“应战”……;“挑战”和“应战”如此永不停息,社会才得以不断变革和发展,而这种

^① 参见上引索罗金文,论文集“*Toynbee's Philosophy of History*”pp. 172~173,版本同。

^② 汤因比把挑战概括为五类:(1)困难环境的刺激;(2)新的生活环境的刺激;(3)打击的刺激;(4)压力的刺激;(5)遭遇不幸的刺激。

变革、发展,迟早将会使这个社会达到文明阶段。如果缺乏“挑战”及“应战”的驱动力,文明也就随时衰亡。

衰亡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衰落;(二)解体;(三)死亡。汤因比以很大的篇幅来研究为什么 26 个文明中,有四个(远西基督教文明、远东基督教文明、斯堪的纳维亚文明、叙利亚文明)出了问题而“流产”了,又有五个文明(波利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土耳其文明)则在它们出生的早期即已停止了生长,而其他文明却成功地生长发育起来。为此问题,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名为“*Civilization On Trial*”(《考验中的文明》)的书,探讨尤详,此不赘述。本谈话录上篇“方法论”,用厄本序言的话说,“谈话的内容集中在……《历史研究》中某些难以捉摸的玄奥成分上”。这样做是成功了:因为抛开了那些在大部头著作中的详细考据和材料,汤因比才得以高屋建瓴、上下古今,将自己著作中较易受人误解或曰“玄奥”的地方,用通俗轻松的语言表现得恰到好处。

下篇“论型式”,所谈也是汤因比文明史研究的基本主题之一。他把文明解体的型式分为古希腊—罗马式、古中国式和犹太式。他认为,少数富有创造力的个人蜕变成少

数统治者,多数“模仿者”则变成“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在汤因比看来,每种文明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因而社会发展的模式(型式),不是人所能强求的。这就涉及历史研究是否能“预测”未来的问题。这样话题就自然触到苏联及其东欧诸卫星国、第三世界以及能源、人口、工业化及环境污染等等一系列“当代”问题。

尽管汤因比在理论上不赞成历史研究可以“预测”未来的看法,但由于他精通国际事务,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30多年后看来,却是十分精彩乃至是“先知”式的。

关于能源问题,汤因比指出,“这个行星(地球)上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既然我们占有着这一星球上全部可以利用的地区,我们就极有可能耗尽这些资源。由于医学的进步,人口正在大幅度地增长,我们所指出的那类生活难题,势必不可抗拒”。他认为,“节制乃是我们能够防止能源枯竭的唯一途径”。不到20年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能源危机问题业已成为全球热门话题。

在汤因比的历史体系中,宗教尤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文明的核心。故而尽管那时勃列日涅夫势如中天,他还是坦率地指出:苏联以军国主义强迫东欧诸卫星国实行与苏联一致的发展模式是不明智的,也决不可能长久。“苏联

的黠武主义”——“以军事技术语言来调动国家资源”与传统的黠武主义并无二致；由于宗教原因，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将最早出现问题。真可谓“不幸而言中”：在这次谈话的十八年之后，不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从苏联独立出来，其他加盟共和国亦纷纷独立，东欧诸卫星国也正式从苏联“模式”中彻底解脱出来，各自走上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苏联也成了“前苏联”了。汤因比充满睿智的预见力和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情怀，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除此而外，汤因比对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问题的探讨也足资我们参考。他认为，过分强调工业化的快速度，将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贫富的极度两极分化、资源被破坏、环境污染……等等。总体看来，他对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痛苦历史充满同情，而对中国未来发展是看好的：“西方极度工业化的殷鉴，有可能会使中国有限的工业化、使中国人的俭朴生活方式、极严格清教徒道德观念，将成为具有积极意义的楷模。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许会乐于仿效”（本书下篇）。尽管事实尚远未能尽于人意，但人口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等毕竟都得到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而近 20

年中国的发展,其成果也足以让世界刮目相看。

为了更进一步增加对汤因比历史观点及其《历史研究》的理解,我们加了一个原书所没有的“附篇”,选了四篇文章:(一)《我的历史观》;(二)《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追求》;(三)《文明为什么衰落——自然环境》;(四)《文明为什么衰落——人的环境》。四文分别选自“*Civilization On Trial*”“*Experiences*”和“*A Study of History*”。这几篇文章分别就其历史观的形成过程、历史学家终极追求应该是什么、写的历史(Written History)中的选择(Choose)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其本国史学家卡尔(E. Karl)的观点相同:认为写的历史都是有所选择的,千千万万人每天都在过卢比河,而只有恺撒过卢比河才成为“写的历史”(E. 卡尔所举的著名的例子)^①。他说过:“我完全承认我的历史观带上了我生活经历的色彩”。“在研究人类事务时,根据何者有价值和何者将来显示出意义来进行选择的问题非常重要”。在本文中,他力劝写历史的人将“把来自仙国的乌有生灵”创造历史的神话抛弃掉,多研究人类自身,因为“历史创造”的“恰是人类自身的行为”。

① 见 E. Karl: “*What is History*”, London, 1953.

以上就《汤因比论汤因比》一书做了扼要的介绍,限于篇幅,遗漏甚多,能引导读者读本书就足够了。

这本小书的翻译,说来话长。我在上研究生时读王夫之的《宋论》和《读通鉴论》,深讶于历史研究中还有这么多的哲学问题。于是雄心勃勃地大量收集中、西方历史哲学史料。

1986年春,日本友人庆应大学高桥智博士来安徽省图书馆访书,我顺便向他提及《*Tonyinbee On Tonyinbee*》一书,没想到,不到一个月,他就将复印的此书寄到了我手中。其时贺麟先生的高足范进学博士为华夏出版社编辑“二十世纪文库”,他催促我将这本小册子尽快译出来。于是从1987年元月起,与单坤琴开始分工翻译,上篇“论方法”及“附篇”,胡益民译,周佐虞校;下篇“论型式”,单坤琴(大部分)、胡益民译,章忠国校。周先生是老一辈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侏儒》等书的译者,曾为我们校过《中国古典小说导论》近一半的篇幅),中、英文水平俱佳;章忠国学兄自安徽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又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专攻国际政治,由他这样一位英语功底厚实又懂专业的人来校改围绕苏联卫星国的“模式”篇,再也合适不过了。我于1988年八月亲自将稿子交给范兄,蒙范兄美意,又对着原文细细

校正了两遍,并将三小节拉丁文补译了出来,同时补充了十几条译注;连字号也一丝不苟地划好了。范兄的敬业精神,真是使人感佩不已。后因范兄即调外省任职,这事搁浅了;稿子后来由柯锦华研究员寄回。这十几年来,我曾三次搬家,再也没有看过这部稿子。直到今年元旦,我彻底清理书籍,才将译稿拿出重看了两遍,觉得似乎仍有出版的价值。

本书在拖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又能得以出版,除范兄当年极力促成外,还得感谢商务印书馆的领导,特别是副总编周洪波同志;同时也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朱泱先生,他的仔细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才能使此书以现在的面目与读者见面。

限于译者语学水平和知识结构,本书的缺点乃至错误在所难免,敬望读者批评指正。

胡益民

2011年2月14日

[补记]本书打印稿出来后,复承安大历史系胡秋银博士细加校阅一遍,在此一并致谢!

2011年6月10日

序 言

这本小书原是汤因比博士与本人为自由欧洲电台1972~1973年度节目所录的十二篇系列广播谈话,承该台合作而成书发行。问世的媒介既属如此,所阐述的内容便自然简略而非正言说论;所能涉猎的论题亦属有限,对所举与谈话内容诸方面有关的论据之出处,也一律未作考据。书中所提出的重要论点,除《再思》一书已广为论及的而外,均系初见。我们试图对汤因比博士探究史实的方法及由此产生的历史构架给予同等重视。而就此两大范畴选取拟谈问题时,却显出了双重侧重:一个侧重是以共产党国家及其党的历史为重点;另一个偏差与前者相互关联又恰成对照,即谈话的内容集中在汤因比博士的《历史研究》中难以捉摸的玄奥成分上。之所以有第一种侧重,看看我们谈话的进行过程自明。我之颇想考验一下汤因比博士对东欧事务总结出来的法则,亦是其原因。第二个侧重则与我的好奇心有关——即总想看看单凭形而上学—神学的历史体系来取代宗教正统学说和平息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忧虑,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G. R. 厄本